

● 世界历史

论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

解 光 云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作者简介] 解光云(1964-), 男, 安徽合肥人,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古希腊史及世界文化史研究。

[摘要] 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原因, 一向为中外学者所关注。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有关此研究的论文日渐增多, 但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奴隶制和奴隶制经济对古代希腊文化发展的影响; 奴隶主民主政治对古代希腊文化发展的影响; 古代希腊文化与古代东方文化的关系等方面, 很少从城市地域空间去观照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原因。文章以雅典为例, 述论了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 其一, 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工商业经济。城市是工商业经济活动的中心; 其二, 文化的繁荣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人才和占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资源。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的文化基础——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才。雅典城市是城邦广行文化教育与交流活动的重要空间和舞台; 其三, 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的政治保障——城邦民主政治的权力机构。城邦民主政治的确立与运作, 始终与城市密不可分。由此说明, 城市是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基石。没有城市, 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将是不可想象的。

[关键词] 希腊; 古典文化; 雅典; 城市因素

[中图分类号] K 54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3-0288-07

在古代希腊各城邦的演进中, 有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公元前 8—公元前 6 世纪, 古代希腊的科林斯、阿果斯、斯巴达和米利都等城市, 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远远胜过雅典。而从公元前 6 世纪开始, 此前落后的雅典却后来居上, 逐渐发展为希腊古典文化的杰出典范。究其原因, 学界析论较多^[1](第 30-35 页), 但很少从城市地域空间去观照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原因。实际上, 历史是有连续性的。古风时代(公元前 8—公元前 6 世纪)空前规模的“殖民运动”所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之一, 就是推动了希腊城市的成长和发展。据统计, 公元前 800—公元前 500 年间, 由希腊城市所建的殖民地达 139 个^[2](P. 160-162)。这种发展不仅仅是城市地域空间的扩展和城市数量的增加, 更重要的是城市经济的活跃。“殖民运动”使希腊人“拥有所需的土地, 最富产的国家(斯基泰、埃及、西西里)为其供给粮食, 他们掌控了集纳世界财富的市场。”^[3](P. 111)希腊人从此成为航海民族腓尼基人的主要竞争对手。正是在城市广为发展的宏阔背景下, 希腊人迎来了古典时代(公元前 5—公元前 4 世纪)的文化盛期。其间, 发展突出的雅典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所必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 自然成为“全希腊人的学校”和时代的翘楚。本文旨在以雅典为例, 探究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 希冀说明城市是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基石。如果离开了城市, 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将是不可想象的。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工商业经济

古典时期,充分发展的希腊工商业经济,无疑是古典文明繁荣的物质基础。而城市集聚了工商业经济,是工商业经济活动的中心。

公元前6—公元前4世纪,希腊世界的工业大有发展,尤其是在阿提卡地区,雅典城市及其外港拜里厄斯的工业特别活跃。手工行业更多,更有组织和更加专门化。出现了冶金业、造船业、制陶业、建筑业、纺织业、制鞋业等多种类型的手工业作坊。以制鞋、冶铁、建筑业和制陶业为例,制鞋业不仅有制男、女鞋的分工,还有裁鞋面、纳鞋底、上鞋等不同工序的分工^[3](P.225)。冶铁业出现了专门负责锻打、铸范、拉风的分工。建筑业则有木工、铸工、铜工、石匠、染匠、金匠、象牙匠、画匠、刺绣匠、浮雕工等的分工。制陶业中有烧瓦工、烧砖工、小像制模工和瓷灯制造工等。伯里克利在一次演说中曾提到众多的职业:木匠、雕刻匠、制模匠、青铜匠、石匠、打金匠、象牙匠、绘画匠、绣花匠、雕金匠等^[3](P.222)。公元前5世纪,阿提卡区成为希腊世界最繁盛的工业区域。“冶金业、造船业、武器制造业和陶器业,使劳里昂区、拜里厄斯港和雅典各区的生活紧张热烈起来,而许多伟大建筑物的构造也表明了雅典文明的光辉灿烂”^[4](第51-54页)。

随着手工业的专业化,作坊和营造成场等手工业生产区应运而生。这时的作坊和营造成场一般规模不大,并可以为私人所有。例如,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父亲就有一个铁匠铺;希腊的军政家克利翁父亲有一个硝皮厂;雅典的演说家伊索克拉底的父亲有一个乐器制造厂^[4](第56页)。

工业的发达,粮食的不足以及海外的开发,促动了商业贸易的活跃,由此导致以城市为支点的市集贸易和邦际贸易的繁荣。“每一个城邦对于周围地区来说都是一个市集,农夫们在那里卖掉他们的产品,换取钱来支付他们的赋税和租金(在某些地方),和购买从外地输入的商品及乡间作坊不能生产的制品(当这些可以用钱支付的时候)”^[5](第52页)。

在市集贸易方面,定期市集是古希腊最为普遍的国内贸易形式。小生产者和零售商人定期聚集于市,调剂余缺,互通有无,交易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不同的市场,按规定的时间开市。交易的商品有蔬菜、水果、干酪、鱼、肉、腊肠、家禽和野鸟、酒、木柴、陶器、铁器、旧货,还有卖书的角落^[3](P.290)。雅典城邦的中心市场是此类市集的典型代表。此外,还有一些依托于城市的节日或竞技会等非经常性的市集。例如,在奥林匹亚、德尔斐、尼密阿和科林斯地峡举行的全希腊竞技会,为雅典守护神雅典娜举行的祝贺节等,都是商贸活动的良好时机。邦际贸易则指希腊各城邦之间的贸易,或希腊人与异邦人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较市集贸易规模更大,辐射更广。在贸易中形成几个重要的商贸中心城市:希腊本土的雅典和科林斯既加工制造常用的金属与贵金属、木材、羊毛、皮革、琥珀、象牙等产品,又向域外输出各种织物、武器和金属器具、毡毯、花瓶、珠宝、美术品、金银雕刻品等。雅典用葡萄酒、橄榄油、纺织品、精美的工艺品、陶器、军器输出,换回谷物、鱼、牲畜、蜜蜂蜡、食盐以及奴隶。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拜里厄斯港是爱琴海上著名的国际商港,运到这里的商品有埃及、西西里、黑海沿岸的谷物、牲畜和皮革,米利都的羊毛,波斯和迦太基的毛毯,阿拉伯的香水,马其顿和色雷斯的亚麻衣料、大麻和造船木材,此外还从各地输入奴隶。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则是联结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当时,希腊商人的足迹已遍及北欧、西欧、英吉利海峡、北海和波罗的海,甚至到达欧亚交界处的未知地区和非洲的西海岸^[4](第62-68页)。

与其他地区相比,由于土地贫瘠,平原狭小,古代希腊的农耕经济并不占优势,雅典就是如此。不可否认,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先前落后的雅典变为公民富足、国家强大的重要原因。国富民强才能进行大规模的智力投资和文化建设。伯里克利曾大规模地兴建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赫维斯托斯神庙、苏尼昂海神庙、大剧场、音乐厅、街道和大型雕塑像等一大批规模宏大的公共文化工程,竭力使雅典成为全希腊最美丽的城市、“全希腊的学校”。据载,建造雅典娜神庙花费竟耗资7000塔兰特,相当于雅典城邦整整7个全年的预算^[6](第358页)。在其执政期间,国家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发展文化事业。演

剧、庆节、献祭等都是开销不菲的公众活动,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其一部分费用由城邦公款支付,大部分则以“社会义务”的形式分摊给富裕的公民。公益捐助是富裕的雅典人的义务,如演剧捐助、海军建设捐助、供应贫民粮食捐助等。色诺芬的《经济论》中记载,苏格拉底曾提醒富有的克利托布勒斯向城市的神及他的友人们尽捐助义务:“必须供奉丰盛的祭品,否则神和人都会找你麻烦。其次,慷慨大方地招待很多陌生人是你的职责。第三,必须宴请市民并对他们有所资助,否则,你就失去追随者。”^[7](II, 5-8)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400个雅典人负担前401年至409年间的泛雅典娜祭庆的巨额款项”^[8](第310页)。古代雅典社会经济生活的相对平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富人”阶层的公益捐助。那么,在相对而言农耕经济并不占优势的古代希腊社会,哪些人可能是富人呢?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从总体上说雅典人的生活仍然是贫乏的。雅典的普通公民,诸如教师、雕刻家、石匠、木工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标准一个样,都是日得一个德拉克马^[9](第253页)。这样的工资收入,除了足够支付一切的必须费用以外,剩余不多,自然无力成为“富人”(即便是有,为数也不会太多)。因此,只有经营获利较多的工商业经济的作坊主和商人或工商业奴隶主,才有可能成为雅典富人阶层中的多数。这种富人阶层的出现,是雅典文化兴盛的必要前提。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文化基础——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才

经济富足,并不一定文化昌盛。文化是人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其主体是人。文化的繁荣必须有相应文化人才和占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资源。古希腊人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10](第27页),“一切公民都要受到同样的教育,而关心这种教育应是国家的本身”^[11](第28页)。雅典人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去做的,从而使雅典城市成为城邦广行文化教育与交流活动的重要空间和舞台。

其一,雅典城市广泛吸纳域外先进文化知识和人才。早在梭伦改革时期,就鼓励外籍工匠移居雅典,设各种专业技师居留的特别区,并给予公民权^[12](XX IV.2)。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更是以海纳百川之势,吸引着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来此学习和交流文化科学知识。“哲学家、作家、学者、艺术家等等,都跑到雅典来,在雅典,他们便有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8](第242页)。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雅典40万人口中,有3万2千名外邦人。他们经营工商业,从事科学、文学和艺术研究,执业法律、医生等。来自于外邦的阿那克萨哥那、德谟克里特、普罗泰哥拉、哥尔基斯、希罗多德、品达、迈伦等文化名家,汇聚雅典。正如伯里克利所言:“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13](第131页)。凡是在西西里、意大利、塞浦路斯、埃及、吕底亚、本都、伯罗奔尼撒或其他地方能找着的合意的东西,都被带到了雅典。而这里所说的“产品”,不仅仅是自然产品,也包括精神产品。这些“产品”都是因为雅典的伟大而被吸引来的。诗歌、音乐和艺术都和商品一样,在雅典城找着了舒适的家乡^[13](第131页)。正是这样一批外邦人和雅典本土出生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以自己天才的创造,将古希腊文化推向了繁荣的顶峰。

其二,众所周知,希腊紧邻西亚、北非等古老文明地区。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有一个东方文化的源头。但是,古老的东方文化既非专为古希腊文化的发展而存在,更不可能自动融入古希腊文明之中。就当时世界来说,已达二三千年之久的东方文化可以被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学习和借鉴。古希腊人能够将东方文化继承、学习、吸纳为推动自己文化繁荣的养料,并加以创造性地改造与发展,形成自有特色的希腊古典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古希腊城市中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希腊人常到国外去旅行,在这一方面,连其他民族中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都相形见绌”^[14](212页)。生活于古希腊城市的许多文化人、知识分子,虚心求教,广泛汲取,“拜东方文明为师”,竭心尽力变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为文化发展优势。他们是繁荣希腊古典文化的功臣和时代的先锋。例如,古代雅典的著名政治改革家和诗人梭伦,青年时代游历经商,遍访小亚细亚沿岸希腊人城邦,考察社会制度与风土人情,结交泰勒斯等名人

学者。博学多才的梭伦因而有了“雅典第一诗人”之殊荣,更得“希腊七贤”之美誉。古希腊哲学家德莫克里特,曾追随波斯术士和迦勒底星相学家学习神学和天文学,师从米利都学派研习自然哲学。后到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等地漫游,向有学问的人求教,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一生中写了约 60 种科学著作,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门知识。马克思称之为“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14](第 146 页)。著名的医生希波克拉底,从小随父学医,曾在小亚细亚、黑海沿岸、北非等地游历行医,学习取经。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出了丰富的医学著作《希波克拉底文集》,成为西方医学的最早奠基人。被誉为西方“历史之祖”的希罗多德,大约从 30 岁开始,历时 10 年游学访察,漫游黑海北岸、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埃及、意大利半岛等地。访查传闻逸事,凭吊历史遗迹,了解风土人情,有助于后来撰述《历史》名著。总之,“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14](第 212 页)。

其三,希腊古典文化长达 200 余年的繁荣,绝非仅靠少数文化人、知识分子的努力,而是在于拥有广泛的公民群众基础和城市活动空间,从而使古典文化具有广博的内涵、恒久的魅力和深远的影响。文化人、知识分子依托城市开办学园,进行全民性的戏剧演艺、宗教节庆、体育竞技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传播了知识,培育了人才,融通了思想,活跃了文化市场,从而使得对戏剧、雕刻、建筑、诗歌、论辩演说等古典文化的认知、理解、接纳和传扬,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公元前 388 年,柏拉图于雅典附近的阿卡德米亚创立学园。园内设有图书馆、授课厅和宿舍等。在柏拉图时期,学院里讲授的主要课程有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该学园是古希腊第一所真正招收学生的学校。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希腊乃至地中海世界的一个学术中心。从学园学成出去的许多学生,在地中海世界的众多地方,传播着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公元前 335 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吕克姆体育场创立学园,从事教学和著述。此外,还有一批“智者”所创办的专门教授论辩技术的学校。这些学园或学校,都是城邦政府所允许的,并认为是为青年的显赫前途提供训练所必须的。诸多学园与学派并立于雅典,使人们在更多学习选择的同时,加深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智者学派的学者们教授在公共场合下演说的艺术和辩论的技艺,为培养适应民主政治时代所需要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人才作出了贡献。雅典的民主政治,决定了当时的社会不是靠暴力、行政手段,而是靠辩论、才识赢得人心的。雄辩的口才,超群的才华,是每一位企求成功的政治家必备的要素。

戏剧演艺是雅典城邦利用戏剧节组织戏剧比赛对公民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伦理道德教育的一种文化艺术活动。活动多是在祭典和节日中以集体方式进行。古希腊至少有 300 个以上由城邦组织的宗教节日,祭奉的神祇超过 400 位。仅在雅典城邦,一年就有 144 天为公共的宗教节日^[16](第 101—102 页)。戏剧演艺活动只在狄奥尼索斯节的祭庆日子里进行。连续 5 天的欢庆,主要是进行戏剧比赛。雅典大剧场是节庆活动的中心,数以万计的人聚集剧场,观看悲剧或喜剧表演。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底斯和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等,以其非凡的创作参赛演出。起初,戏剧演艺只是祭仪的附属品,后来逐渐取得社会意义,成为政治的论坛,休息与娱乐之地。戏剧演艺也便有了独特的文化价值,“希腊城邦的一般文化的高度水准,在很大的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组织民众、教育民众、启发民众的戏剧”^[8](第 318 页)。公元前 480 年—公元前 380 年的 100 年内,雅典演出的戏剧有 2000 多种。

宗教节庆与体育竞技活动是雅典城邦利用宗教节日组织的全民性的文化活动。主要节庆赛会有泛雅典娜节、狄奥尼索斯节和厄琉息斯密仪等。泛雅典娜节年年举行,4 年一大庆,庆节一连 6 天,雅典所有民众都参加。庆节活动有赛马(赛战车)、徒步竞走、歌唱、舞蹈、朗诵比赛与音乐比赛。狄奥尼索斯节和厄琉息斯密仪也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在这些节日里,不仅有体育锻炼,同时也有心智和精神的娱乐,因为那时有艺术布景和表演”^[13](第 131 页)。伯里克利在其著名的葬礼演说中说过:“整个一年之中,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每天怡娱乐目,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忧虑。”^[13](第 130 页)

戏剧、艺术、哲学、竞技等文化活动,是传扬古典文化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对公民而言,这不只是闲

暇之余的精神娱乐，也是接受城邦制度、民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教育活动；是认知、理解、接纳古典文化的有效过程。知识、价值和思想在公共广场上接受公众的批评和争议，“以前属于军事贵族和祭司贵族的精神世界现在向越来越多的人开放，直到向全体平民开放，而希腊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的”^[18]（第 39 页）。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言，体育馆、康体馆和剧场“不仅仅是铸造了城市的形态：同样，每个场馆也经由旅游和朝圣而达到更广泛的文化交融之目的”^[18]（P. 168）。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政治基础——民主政治的权力机构与活动空间

雅典城市能够吸引更多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与其施行民主政治所带来的宽松而自由的城市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在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市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尽管也有这样的事实：苏格拉底以其政见不同而被处死；阿那克萨哥拉和普罗泰哥拉两位哲学家被迫离开本国。但是，雅典城市的宽容和自由的文化环境，“比之大多数其他国家，不论在古代还是近代的国家，都要好些”^[19]（第 258 页）。“雅典那时有一种活泼的自由，以及礼节、风俗和精神、文化上活泼的平等；……在不违背这种平等和在这种自由的范围以内，一切性格和才能上的不同、以及一切特质上的参差，都取得最无拘束的发展，都在它的环境里取得最丰富的刺激，来发扬光大”^[19]（第 258 页）。人们可以尽自己之所想，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或讽刺、或褒扬，或辩论各种思想、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城邦民主政治的确立与运作，始终与城市密不可分。

其一，自梭伦开始直至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雅典历次民主政治改革的推行，都直接或间接地维护了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并因此而有力地扩大了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例如，梭伦改革的核心，是以财产特权代替贵族世袭特权，按财产划分公民等级，以等级确定权利和义务。公民财产主要依据其田产的年收入，工商业者则按其货币收入折合成实物来计算。从而削弱了氏族贵族所享有的种种特权，使工商业奴隶主有机会跻身于国家领导层，更多的“富人”可以走上政坛。恩格斯遂将公元前 594 年梭伦改革后的 80 年，概括为从事工商业的富人对旧的贵族势力的胜利竞争的时代，同时又是“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盘”的时代^[20]（第 112 页）。梭伦之后的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基本上继续推行或发展梭伦的立法。古典时期，自由手工业者的人数在公民大会中明显增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色诺芬等也同样认为，约在公元前 5 世纪末，工人在议事会中占了多数^[4]（第 58-59 页）。

其二，雅典国家机构最重要的是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公民大会是雅典城邦最高权力机关，10 天召开一次，凡年满 20 岁的男性公民皆可出席，讨论和决定国家大事；议事会为雅典城邦最高行政机关。会议成员 500 人，执行公民大会的决定和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陪审法庭乃雅典城邦最高司法、检察机关。陪审员由每个地区各选 30 岁以上的男性公民 600 人，全雅典共选出 6000 人，组成 10 所高等法庭，审理重大案件并参与立法和监督公职人员。一方面，这些权力机构大多设置于城市，以城市为重心运作。考古资料表明，在城邦基本的政治机构如公民大会和议事会出现的同时，市政公共建筑如市政广场、公民大会会场和市政大厅随之出现^[21]（P. 101）。市政广场是交流信息、参与市政议会和公民大会的“民众集会之所”。在雅典，由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通常是在市政广场或其西南面的匹尼克斯山举行。城邦的法律、法令、公民大会和议事会的决议等，皆公告于此。有关城邦政治和国民事务的文献保存于市政大厅。“议事院则是一个服务于公民大众的相当大的地方，通常位于市政广场其间或其附近”^[18]（P. 182）。雅典城墙圈内即是政府所在地和贵族上层人物的居住区。政治和宗教首脑的居住地分布于城市中心广场附近的林阴道两侧。下层人物远离城市中心区。各分散的居民区用矮墙或壕沟分开，形成分散隔离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区。随着民主制的确立，特别是希波战争后，曾作为军事、政治、宗教中心的雅典卫城中心广场，主要供人民集会和商业之用。广场的东、西、南三面有柱廊，后面是商店与庙宇。北面是建于平台之上的神庙，供人们休息与交易。紧邻神庙的则是市民政治集会

的地方——市政厅。另一方面,城邦民主政治的权利属于城市的成员——全体公民。“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总是最高的权威”^[22](第199页)。有学者认为,公民的政治权利主要体现为有权参加城市的政治生活——可以出席市镇会议、担任公职等。公民大会是每个年过20的雅典人都有资格参加的一种“城镇会议”^[23](第26页)。

此外,城市中的露天剧场和柱廊也是城邦政治生活的重要空间。雅典的公民大会有时就在剧场举行^[24](L XII.4)。早在古风时期,“建筑师们就已经认识到柱廊不仅是有用的、附加的建筑装饰,而且对扩展空间——广场(agora)神龛,体育馆等等——在有限的空间支撑一个顶棚,提供一种装饰并赋予其特定的意蕴,也是重要的附属建筑”^[25](P.193-195)。柱廊作为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空间,一直持续到希腊化时期。

至此不难看出,城邦既有国家的某些基本属性,如设置公共权力机关等,又有城市的要素和特征——集聚性。城邦一词有“城市”、“国家”、“公民集体”三个含义。城市并非城邦,而只是城邦的一部分。雅典城邦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公民为主体、国家为本质的共同体,而城市是其空间中心和活动中心。古典时代的雅典城市,是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场所,是城邦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教育的中心。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基石是城市。其之所以以雅典城邦为典型,这是与雅典城市对文化发展的突出贡献分不开的。

“希腊城市犹如希腊艺术和思想一样,是个‘奇迹’”^[26](P. viii)。

(本文写作幸得恩师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敦书先生的悉心指导,谨致以谢意。)

[参考文献]

- [1] 杨俊明.古代希腊文化繁荣原因研究概述[J].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世界史,1997,(2).
- [2] BOARDMAN, John and HAMMOND , N.G. L.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second edition). Volume III. Part 3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3] GLOTZ, G. Ancient Greece at Work: an Economic History of Greece[M]. London: 1926.
- [4] [法]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M].志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 [5] [法]保罗·贝罗克.城市与经济发展[M].肖勤福,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 [6] [苏]B.H.迪雅可夫,H.M.尼可尔斯基.古代世界史[M].日知译.北京: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1954.
- [7] XENOPHON. VI.Oeconomicus[M].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8] [苏]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M].缪灵珠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
- [9] [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一卷[M].罗经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10] 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 [11] 曹孚.外国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 [12] PLUTARCH .Lives I . Solon[M].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3]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 [14]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M].吴象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 [15]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16] 黄洋.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J].历史研究,2001,(5).
- [17] [法]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M].秦海鹰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
- [18] MUNFORD, Lewis. The City in History[M]. Penguin Books, 1961.
- [19]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 [20]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1] SNODGRASS, A. Archaeology and the Rise of the Greek State (inaugural lecture)[Z].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22]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
- [23] [美] 乔治·霍兰·萨拜因. 政治学说史:上册[M]. 盛葵阳, 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 [24] ARISTOTLE, X. X.. Athenian Constitution [M].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25] LEWIS, D. M., BOARDMAN, John, DAVIES, J. K., OSTWALD, M.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second edition): Volume V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26] GLOTZ, G. The Greek City and Its Institutions [M]. London, 1929.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City Factors on the Brilliance of Greek Culture in the Classical Age

XIE Guang-yun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Biography: XIE Guang-yun (1964-),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Doctoral candidate,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majoring in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 and of world culture.

Abstract: The causes of the boom of classical Greek culture have long received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Particularly since 1980s more and more publications on this subject have appeared. However, most of them focus on the influences of slavery, slavery economy and democracy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Greek culture, the relation between ancient Greek culture and ancient oriental culture, and so on; few of them approach the subject from city perspective. Taking classical Athens for an example, this thesis aims at expounding on the following city factors which engendered the boom of classical Greek culture: 1. It is in the city that businesses gather, which offer material basis for the prosperity of classical culture, the city is the center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ctivities; 2. The boom of culture requires corresponding talents and rich cultural resources; it is in the city that knowledge and intelligence assemble. Athens is the significant stage for the polis to carry out cultural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3. It is in the city that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polis democracy are located, which provide political assurance for the boom of classical Greek culture. 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 polis democracy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city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Hence city is the basis for the boom of classical Greek culture. Without city, it would be hard to imagine such a brilliance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Greece.

Key words: Greece; classical culture; Athens; city factor